



南强史学丛书

马良怀 / 著

Intellectuals Emperor Eunuch

# 士人 皇帝 宦官

岳麓书社





马良怀文集

马良怀 / 著

Intellectuals Emperor Eunuch

士人 皇帝 宦官

岳麓书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士人 皇帝 宦官/马良怀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03

ISBN 7-80665-316-3

I. 士... II. 马... III. ①政治—研究—中国—魏  
晋南北朝时代~唐代—文集②社会生活—研究—中国—魏  
晋南北朝时代~唐代—文集 IV. D 6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1531 号

责任编辑 曾 倩

封面设计 黄 朝

## 士人 皇帝 宦官

马良怀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新民路10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市宏发印刷厂印刷

200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333千字 印数: 1-2,500

ISBN7-80665-316-3

G·328 定价: 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长沙市芙蓉中路造化塘29号 邮编: 410007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885616 邮编: 410006

## 出版缘起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已经走过 80 多年的风雨历程。她建立于 1921 年，是厦门大学最早设立的系科之一，长期以来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的本科毕业生，数百名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成为培养优秀人才的知名摇篮。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辛探索和薪火相传，我系形成了深厚的学术传统和显著的办学特色，现拥有专门史全国重点学科、国家历史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下设 6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8 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并与海外许多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比较稳固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关系。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系在教学与科研相长思想的指导下，继承发扬传统研究特色，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学科生长点，科研论著迭出纷呈，受到学术界、教育界同仁的瞩目与赞誉。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系的教学科研事业，更好地展示和交流有关成果，我们特推出这套丛书，以期与同志友好为繁荣 21 世纪中国历史学科而共同努力。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  
2003 年 8 月

## 目 录

## 一、士人风流

|                             |         |
|-----------------------------|---------|
| 东汉后期的忧国之士·····              | ( 3 )   |
| 论东汉党锢之祸·····                | ( 16 )  |
| 死亡与东汉后期人的觉醒·····            | ( 30 )  |
| 汉晋之际庄园经济的发展与士大夫生存状态之关系····· | ( 41 )  |
| 汉晋之际士人与琴之关系·····            | ( 59 )  |
| 黄宪魅力发微·····                 | ( 80 )  |
| 王导、谢安实践道家政治哲学的不同特点·····     | ( 93 )  |
|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理解·····             | ( 106 ) |
| 苏曼殊对爱的理解与实践·····            | ( 112 ) |

## 二、皇帝心态

|                    |         |
|--------------------|---------|
| 皇帝的自卑·····         | ( 121 ) |
| 皇帝的焦虑·····         | ( 134 ) |
| 皇帝与师傅、乳母之关系·····   | ( 146 ) |
| 曹操的自卑与超越·····      | ( 157 ) |
| 传统文化与武则天的负罪意识····· | ( 168 ) |

## 2 目 录

---

### 三、宦官制度

|                     |       |
|---------------------|-------|
| 中国宦官制度长久生存之原因 ..... | (181) |
| 先秦宦官考 .....         | (193) |
| 两汉宦官考 .....         | (207) |
| 三国两晋十六国宦官考 .....    | (225) |
| 唐代宦官考 .....         | (246) |
| 唐代宦官与士大夫之关系 .....   | (260) |
| 唐代宦官与皇帝之关系 .....    | (275) |

### 四、思想文化

|                      |       |
|----------------------|-------|
| 文化转型与权威思想 .....      | (291) |
| 中西死亡观的比较分析 .....     | (301) |
| 两汉宇宙期与道教的产生 .....    | (310) |
| 魏晋玄学与长江文化之关系 .....   | (322) |
| 唐代《老》学对内在权威的建构 ..... | (352) |
| 张湛道儒互补的政治思想 .....    | (360) |
| 张湛对人生的思考 .....       | (372) |
| 葛洪对道德的思考与重构 .....    | (388) |
| 韩愈、李翱思想的历史位置 .....   | (397) |

|          |       |
|----------|-------|
| 后记 ..... | (411) |
|----------|-------|

## 一、士人风流





## 东汉后期的忧国之士

翻开我国的历史典籍，便可清楚地见到这样一种现象：大凡国政走向衰败或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总有一批人挺身而出，为清除弊政或挽救民族的命运而竭诚尽力，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由于他们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生死存亡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将其称之为“忧国之士”。在腐朽衰败的东汉后期，就曾涌现出一大批这样的忧国之士，成为当时社会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全面认识这批忧国之士，不仅对于深入了解东汉社会的历史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我们研究历史上类似的社会现象亦能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 一

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并弄清楚这个历史范围内的社会状况如何，是分析任何一

个社会问题的出发点。

秦汉社会是我国历史上土地买卖制度和土地私有制度的确立时期。伴随着这种土地制度的成长，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局面，豪强大地主经济得到了一个大的发展。东汉政权就是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皇帝是其豪强大地主利益的总代表。

尽管豪强大地主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土地兼并，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但这种生产关系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这就是东汉灭亡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三国、魏晋），豪强大地主经济仍然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应当说，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代表豪强大地主利益的东汉统治政权同当时的经济基础也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问题就在于光武帝刘秀错误地总结了西汉后期数世失权、强臣窃命的教训，进一步扩大了汉武帝刘彻以来权力过分集中的错误。他蔑弃了正规的丞相制度，使相互钳制的三公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这就为后来的外戚宦官擅权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因为皇权的加强往往引起内朝官的得势，在皇帝有能力控制朝政的时候，社会政治还比较安定。而当登基的皇帝是一个幼年孩童的时候，必然是太后听政，皇帝的那份异常集中的权力也就自然落入外戚之手。东汉的外戚们往往仿效西汉霍光、王凤等人的做法，用位于丞相之上的大将军头衔来总揽皇帝的权力。随着皇帝年龄的增长，必然要求得到属于他的那份诱人的权力，但外戚又岂肯拱手奉还？于是皇帝便组织他惟一可以接近的亲信——宦官进行武力争夺。然而，这庞大的权力又并非寻常之人所能独控，于是，权力到手的皇帝便设法扩大宦官的权限，因为他们认为“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sup>[1]</sup>。所以就委以重任，作为自己的助手，以便同外戚抗衡。这样，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斗争中，便

产生出一个新的集团，并且势力发展迅猛，终于酿成了东汉后期的巨大灾祸，这又是皇帝们始料所不及的。

东汉王朝自和帝始，便陷入了外戚与皇帝、宦官争夺权力的拉锯战，直到王朝的灭亡。两大集团为了扩充各自夺权的实力，便逐渐将察举制度演变成为拉帮组派、结党营私的工具。卿校牧守之选，皆出各自私门，或“任其子弟、宾客以为州郡要职”，或委派“年少庸人，典据守宰”<sup>[2]</sup>。造成朝廷“侍中并皆年少，无一宿儒大人可顾问者”<sup>[3]</sup>的局面。从朝廷到地方，多是一些凶狡无行之徒窃居官位。他们既无德行，亦无统治才能，除了争权夺利，便是为非作歹，挥霍钱财。为了满足他们糜烂生活的需要，赋敛日益加重，至使“穷破天下，空竭小民”<sup>[4]</sup>。广大百姓“或绝命于箠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sup>[5]</sup>。加上朝廷陷入周而复始的争权夺利的漩涡，无心治国安民，水利长年失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就日益降低。广大农民被逼到死亡线上，引起了阶级矛盾的激化，越来越多的农民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在被压迫阶级中，少数民族的遭遇则更加悲惨，他们集阶级和民族的压迫于一身，所以反抗就更加激烈。统治者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便在全国范围内摆开屠场，不惜耗费巨额资金进行血腥镇压，造成“府帑空竭”<sup>[6]</sup>。关于东汉后期的社会状况，桓帝时的光禄勋陈蕃曾作过概括性的总结：“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是谓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离散，是陛下焦心毁颜，坐以待旦之时也。”<sup>[7]</sup>这就是东汉后期社会的真实写照。

## 二

面对着封建秩序的严重破坏和东汉政治的腐朽衰败，统治集

团中一大批忧国之士勇敢地站了出来，力矫弊政。开始，他们还只是像杨震等人那种个别人的行动，但随着国政腐朽程度的加深，到顺、质帝时便逐渐形成了以李固、杜乔等人为代表的、与外戚宦官集团直接相对立的势力。这种势力的发展与东汉社会的腐朽程度成为正比。到桓、灵帝时，大批忧国知识分子——太学生的自觉参加，使忧国之士的势力迅速扩大，成为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在挽救东汉王朝命运的过程中，他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 他们针对外戚宦官争权擅政的情况，要求“国政一由帝命”<sup>[8]</sup>，希冀通过皇帝来改弊匡失。一方面，当年幼的皇帝成人之后，他们要求外戚交权，让皇帝亲政。在窦宪“兄弟放纵”、“权行四方”时，乐恢上疏要求和帝亲理万机，被窦宪迫害身死；杜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乃与同时郎上书直谏”<sup>[9]</sup>，被邓太后揍了个死里逃生；李固上书顺帝，要梁冀及诸侍中还居黄门之官，“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sup>[10]</sup>。另一方面，他们特别注重皇帝的废立，以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主张“宜择长年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sup>[11]</sup>为君。李固为实现这种主张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二) 纠正用人之弊。他们明确提出要罢免那些不学无术、为非作歹之徒，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sup>[12]</sup>。同时，他们还提出一整套选人、用人的具体政策：“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sup>[13]</sup>他们不畏豪强，不偏权贵，坚持选贤进能的标准。有一次当举孝廉时，中常侍侯览遣使请托于河东太守史弼，史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当选士报国。”于是将来使“即日考杀之”<sup>[14]</sup>，因此被抓进监牢。

即便是自己的亲属，他们也同样坚守原则。如范滂为汝南功曹时，中常侍唐衡将“为乡曲所弃”的范滂外甥李颂请托于太守宗资，资用为吏，但范滂以为用非其人，所以“寝而不召”<sup>[15]</sup>。

（三）打击不法豪右，严治害民之徒。忧国之士认为，东汉王朝之所以日益衰败，主要是一些不法分子胡作非为所致，他们是东汉政权的蛀虫，是其心腹之患。所以，忧国之士对这些人的打击也就毫不留情。陈龟为京兆尹时，“三辅强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龟到，厉威严，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内大悦”<sup>[16]</sup>。南阳太守王畅对于帝乡的贵戚豪族“有衅秽者，莫不纠发。会赦，事得散。畅追恨之，更为设法，诸受臧二千万以上不自首实者，尽入财物；若其隐伏，使吏发屋伐树，堙井夷灶，豪右大震”<sup>[17]</sup>。永和初，张衡出任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擒，上下肃然，称为政理”<sup>[18]</sup>。他们还严厉惩办了青州刺史羊亮，辽东太守孙谊，益州刺史侯参，宦官的爪牙徐宣、张朔等等一大批贪残害民的不法分子。在忧国之士的打击下，不法分子感到害怕了，李膺迁青州刺史时，“守令畏威明，多望风弃官”<sup>[19]</sup>。范滂为清诏使时，“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去”<sup>[20]</sup>。桓帝延熹四年，刘祐迁司隶校尉，“时权贵子弟罢州郡还入京师者，每至界首，辄改易舆服，隐匿财宝，威行朝廷”<sup>[21]</sup>。

（四）缓和阶级矛盾。为了使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他们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1. 创造条件，把农民安置在土地上，减少流民的人数。延平元年，张禹上言将广成、上林等苑囿空地“以假贫民”<sup>[22]</sup>，得到邓太后的允许。汝南太守何敞“修理颍阳旧渠，百姓赖其利，垦田增三万余顷”<sup>[23]</sup>。2. 救济灾荒之民。如盖勋领汉阳太守时，“人饥，相渔食，勋调谷禀之，先出家粮以率众，存活者千余人”<sup>[24]</sup>。韩韶任羸地之长时，“其

流入县界求索衣粮者甚众。韶愍其饥困，乃开仓赈之，所禀贍万余户。主者争谓不可。韶曰：‘长活沟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sup>[25]</sup>。3. 对已经举兵起义的农民进行安抚，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五）怀抚少数民族。在“四方离散”的时代，忧国之士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对少数民族做了大量工作。其中除了对多次举兵反叛东汉政权的羌族实行安抚外，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亦能“诚心怀抚，信赏分明”。如种暠出任益州刺史，“在职三年，宣恩远夷，开晓殊俗，岷山杂落皆怀服汉德。其白狼、槃木、唐菟、邛、僰诸，自前刺史朱辅卒后遂绝；暠至，乃复举种向化”。后擢为度辽将军，“羌虏先时有生见获质于郡县者，悉遣还之。诚心怀抚，信赏分明，由是羌胡、龟兹、莎车、乌孙等皆来顺服。暠乃去烽燧，除候望，边方晏然无警”<sup>[26]</sup>。又如傅燮“善恤人，叛羌怀其恩化，并来降附，乃广开屯田，列置四十营”<sup>[27]</sup>等等。由于他们对少数民族诚心怀抚，所以甚得其爱戴。种暠由凉州刺史迁汉阳太守时，“戎夷男女送至汉阳界，暠与相揖谢，千里不得乘车”。后转任辽东太守，“乌桓望风率服，迎拜于界上”。死后，“并、凉边人咸为发哀。匈奴闻暠卒，举国伤惜。单于每入朝贺，望见坟墓，辄哭泣祭祀”<sup>[28]</sup>。可见少数民族对其崇敬怀念之情。

上述这些改弊匡失的努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起到过很大的作用。它有力地钳制了腐朽派的手脚，在客观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部分愿望和要求，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使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得到了缓和，延长了东汉王朝的寿命。范晔有言：“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sup>[29]</sup>如果我们把其中的“数公”理解为东汉后期忧国之士的代表的话，这种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

## 三

在消除弊政、挽救东汉王朝命运的过程中，忧国之士们“各奋死与之撓柱，虽湛宗灭族，有不顾焉”<sup>[30]</sup>。是什么思想在指导着他们这种大无畏的行动呢？

我们知道，东汉社会是谶纬之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否就是这种思想在起指导作用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谶纬之学发展到东汉后期，已达荒诞不经的地步。统治集团的成员都逐渐认识到谶纬之学不过是一种为己服务的工具。皇帝、外戚、宦官用它来策免大臣，打击忧国之士；而忧国之士则用它来弹劾外戚、宦官，束缚皇帝的手脚，达到消除弊政的目的。谁也没有把它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那么，究竟是什么思想在指导忧国之士呢？最好还是让他们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李固为了争立一个年长德高的人做皇帝而惨遭梁冀迫害，临刑前他写信谴责卖友保冠的胡广、赵诚曰：“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sup>[31]</sup>何敞云：“夫忠臣忧世，犯主严颜，讥刺贵臣，至以杀身灭家而犹为之者，何邪？君臣义重，有不得已也。”<sup>[32]</sup>张衡在《思玄赋》中写到：“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其弗违。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sup>[33]</sup>通过上述忧国之士的言行我们可以知晓，先秦孔、孟的“玄训”才是他们行动的指南，其中尤其是所谓“仁”、“义”。对于孔孟思想中“仁”的涵义，论述的文章不少，此不赘述。而对于其“义”的涵义，探讨的人却不多，但是，它对东汉忧国之士曾起过极大的直接指导作用，是我们分析其指导思想的一个关键。所以我想在此对孔

孟思想中“义”的涵义作一个简明的归纳，以便探清它与东汉忧国之士的关系。

唐代思想家韩愈曾对“义”下过一个定义：“行而宜之之谓义。”<sup>[34]</sup>西汉的大思想家董仲舒在谈到仁与义的作用时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sup>[35]</sup>孟轲自己也反复强调，义是人的一条正路。也就是说，义，是对自己尽道德责任，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道德规范。鸠合孔孟的言论具体分析，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忠君王，敬兄长，存羞恶之心，舍不义之财。可以这样认为：孔孟的义，是一个由个人及家庭，由家庭及国家，核心是为国家的把身、家、国三者紧密融合在一起的完整的道德观念。人们的自觉行动，往往（当然不是全部）是由一定的道德观念所支配的，而支配东汉后期忧国之士许多重大自觉行动的，就正是孔孟的这套道德观念。我们可以综合他们当时三个大的方面的自觉行动来予以说明：

#### （一）积极辅政治国，反对逃避现实。

东汉后期，群奸当道，国事日非。许多人——如郭泰、袁闳等，为了保身全家，置国家命运而不顾，远离政治舞台。忧国之士则不然，他们认为，“辅政济民，今之时也”<sup>[36]</sup>。在“秽恶满朝”的情况下，“不能奋身出命埽国家之难，虽生吾不愿也”<sup>[37]</sup>，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挽救东汉王朝命运的斗争之中。对于那些逃避现实，舍国保身的人，他们痛加指责。如李膺的妹夫钟瑾逃避政界，李膺批评他说：“孟子以为‘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与孟轲同邪！”<sup>[38]</sup>永康元年，桓帝驾崩，“国嗣未立，诸尚书畏惧权官，托病不朝。（陈）蕃以书责之曰：‘古人立节，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床？于义不足，焉得仁乎！’诸尚书惶怖，皆起视事”<sup>[39]</sup>。

#### （二）舍身为国，威武不屈。



孟轲提倡，一个人应该培养“集义所生”的“浩然之气”<sup>[40]</sup>，如此，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sup>[41]</sup>。东汉后期的忧国之士是这一教条的忠实实践者。司隶校尉李膺捕杀“贪残无道”的张朔后，桓帝“洁以不先请便加诛辟之意”。李膺义正词严地答道：“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愿也。”<sup>[42]</sup>史弼因拒绝侯览的请托而遭诬陷被捕，送行的裴瑜愿他“不忧不惧”。史弼答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昔人刎颈，九死不恨。”<sup>[43]</sup>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李膺、范滂、巴肃等人自动入狱献身，杜密、魏朗等人自杀以身殉国，浩然正气，纵贯千古。

### （三）执政清廉，洁身自好。

东汉后期是一个腐朽透顶的社会，而忧国之士们却能牢记先圣的“玄训”，出污泥而不染。张奂任安定属国校尉时，“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锯八枚”。张奂把主簿叫到羌人的面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将金、马如数退还。由于他能正身洁己，所以“威化大行”<sup>[44]</sup>。刘宠“前后历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约省素，家无货积”<sup>[45]</sup>。崔寔虽“历位边郡”，但死的时候却“家徒四壁立，无以殓歛”<sup>[46]</sup>。汉灵帝初，窦太后认为太傅陈蕃“辅弼先帝，出内累年，忠孝之美，德冠本朝”，所以封他为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而陈蕃却坚守“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的准则，前后十次上章辞让，“竟不受封”<sup>[47]</sup>。太尉黄琼也前后七次上章，辞掉了桓帝给他的“祁乡侯，邑千户”<sup>[48]</sup>的封爵。

通过以上这三个方面的自觉行动可以看出，孔孟宣扬的道德观念，对东汉后期的忧国之士起着多么密切的指导作用。